

信任

——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

[美] 弗兰西斯·福山 著

一个全新的经济学研究方向
福山再次为知识界带来震撼



信 任

——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

[美] 弗兰西斯·福山 著
李宛蓉 译

远方出版社

信任

——
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

〔美〕 弗兰西斯·福山 著

责任编辑:文 亚

封面设计:海 男

2050/16

信 任

[美] 弗兰西斯·福山 著

李宛蓉 译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15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00 字数:300千字

1998年8月第1版 199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80595-457-7/F·36 定价:20.00元

本书相关评论

古老以来，“信任”即是人类具有的情操表现，这一大阵子为西方社会理论捡了回来，做为思辨社会形构，特别是当代社会的概念性基轴。如此在思考立场上鲜明地把“人”的地位标示出来，具有浓厚的人文意涵。福山先生分享着这样的思考模式，以“信任”当主轴，延续其昔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中的论述，爰引丰富的具体经验资料，来刻划前社会秩序。其论述精闳，令人激赏，是一部值得阅读，读了之后不会令人后悔的好书。

——叶启政(台湾大学社会系教授)

福山提出“历史的终结”论点一炮而红，一般人也许预期他会再出一本续集，不过福山的新书《信任》却提出完全不同的议题，只不过他的野心仍然可以媲美上次。这次他的主题是社会信任度在经济生活上的角色。本书原创性十足，趣味盎然，读来亦十分引人入胜。

——Mancur Olson(美国马里兰大学学院校区经济学教授)

读者调整原有思考方式，同时也对国际间不同的文化开启了許多振聋发聩之比较。

信 任

——Michael Novak(一九九四年 Templeton 桂冠学人，
美国企业研究院宗教与公共政策部门主席)

福山在本书中把焦点集中在信任度存在与否所造成的结果上，使读者对于社会资本有了崭新而精确的认识；这本书问世之后，我们再也不可能忽略文化的前提而单独分析经济成长的议题。想要了解国家财富真正来源的人，《信任》一书是不可或缺的读物。

——William A. Galston(美国马里兰大学学院
校区公共事物学院教授)

福山又办到了。在上一本著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里，福山在知识界引发了令人惊异的效应；这次我们从他的新书里学到，一个社会的“自发社会力”是该社会经济结构的关键，那些认定社会行为以个人主义欧裔模式和团体导向亚裔模式为两种极端，其余行为模式皆处于此二者之间的人，必须重新思考这个议题了。福山再一次为知识圈带来一股震撼。

——Henry S. Rowen(美国斯坦福大学商学教授，
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对于想要了解当代社会经济表现何以良莠参差的经济学家门外汉来说，福山的新书《信任》将会成为最受欢迎的读物；福山对社会核心价值观持有独特的见解，他认为这些价值观念引导了美国、亚洲、欧洲企业与政府的行为，本身也是一项原创

本书相关评论

性的概念架构,有助于我们了解冷战结束后世界许多紧张情势的根源,其中包括贸易与人权等多元化的议题。

——David Hale (Kemper 金融服务公司投资部经理)

“信任”中文版序

弗兰西斯·福山

忽略文化因素的生意人，只有失败一途

本文为福山应本公司之要求所写的中文版序，对于当前亚洲经济危机，提出他的看法。虽然福山不认为本次亚洲经济风暴乃是导因于若干亚洲价值观的失灵，但他提醒从事跨国生意的人若忽略了文化因素，是很容易招致失败的。

一九九七年夏天以来，亚洲笼罩在经济危机的风暴中，一开始是泰铢贬值，接下来迅速蔓延至韩国与日本，这一连串经济上的重挫已经改变了世人对“亚洲经济奇迹”的态度。十年以前，特别是在日本“泡沫经济”的高峰期，世人普遍认为亚洲社会创造了快速成长的新模范，而且这种新模范拥有很强的文化因素：例如亚洲一些知名的意见领袖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和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都主张，亚洲的文化价值观融合了人民对社群威权的尊敬、对家庭的重视，加上政府立意甚佳的强势领导，以及人民优秀的工作伦理，这样的文化价值观特别适合亚洲国家的市场发展，也有助于加速亚洲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但是，如今亚洲国家——目睹投机客炒作他们国家的货币，国内失业人口节节上升，整个亚洲地区企业倒闭的例子像

燎原野火烧个不停，于是人们的看法开始转向另一个极端。特别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眼里，现在亚洲价值观反而被许多人视为亚洲问题的根源，而不再是亚洲国家成功的依据。如今家族主义式的信用分配、过度干预的政府、“亲旧型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变成众矢之的。投资人因为这些理由而对过去一度欣欣向荣的亚洲经济丧失信心。

有鉴于目前的辩论皆以文化与价值观为靶心，我认为确切了解文化因素与传统经济因素的互动关系，在此时更显得意义重大，因为这不仅能厘清亚洲成长的历史轨迹，也有助于找出一条化解眼前危机的途径。我相信，无论是探讨亚洲高度成长的根源何在，或是归咎当前问题的罪魁祸首为何，人们都太过强调文化因素了；经济成长是两种因素的联合产物，也就是传统的总体经济因素(例如适切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加上容许稳定与持久制度的政治架构，眼前亚洲的金融危机并非导因于若干亚洲价值观的失灵，而是亚洲政府采行的错误政策所致。文化对一个社会创造健康制度的能力极为重要，但是文化对于经济成长鲜少有直接的影响，诚如我在《信任》一书中所指出的，文化只在经济成长的因素中占据百分之二十的比重。

不过，我们必须从其他角度来看待文化的影响。譬如说，建立在家庭、血亲关系、地缘或其他私人情谊上，而不是建立在客观经济标准上的交易方式，在亚洲国家里极为盛行，其普遍程度远超过北美洲或欧洲，可是即使在亚洲每个国家依赖私人情谊的程度也不尽相同；以日本为例，企业界里陌生人对彼此具有互惠的义务关系，但是在中国南方，生意往来关系主要还是依据彼此血亲和地缘的亲疏。至于私人因素对于亚洲

“信任”中文版序

各国的影响,差别也很显著:在利用私人关系争取信用方面,日本、韩国、台湾比其他亚洲国家更有能力减轻其造成的伤害——至少到最近为止是如此。

我希望中文版《信任》能帮助读者更清楚了解到文化对经济发展的真正重要性,西方经济学家向来严重忽略我们经济生活中的文化因素,原因是文化因素无法吻合经济学界所发展出来的通用成长模式,然而只要做过跨文化生意的人都知道,文化因素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胆敢忽略文化因素的生意人唯有失败一途。

在二十世纪即将划上休止符的此刻,了解文化价值观在全球化经济里的适切角色,绝对具有关键的重要性,我们应该体认到文化因素既不是万灵丹,但影响力也不容低估;亚洲社会现正陷于太平洋战争以来最险恶的经济危机之中,如果想要突破重围、否极泰来,就更应该了解这一点。

一九九八年二月于维吉尼亚州麦里恩市

导读：“蜜蜂的寓言”之现代版

一七一四年，一位荷裔英国医生曼德维(Mandeville, B.)发表了一本小书，《蜜蜂的寓言：或是个人的恶德，公众的福祉》。这本小书在十八世纪广为流传，其基本论点为十八世纪的政治经济学者所接受，也是现今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立足点。曼德维的基本主张为，人性本是自私自利、追求自己欲望之满足，否认人类自私自利的性格根本就是伪善的说法。然而悖论的是，从个人的自私自利行为出发，却反而能真正成就公共的繁荣与福祉。公众的福祉并非建立在个人的德性之上，相反的，却正是以个人的恶德为基础。

这样的主张隐含在今日所有经济学教科书开宗明义的界定里，经济行为乃是理性追求效益极大化的行为，而以此行为模式出发所形成的自由市场经济乃是最成功的经济模式，是追求经济发展最有效的方式。这正是偏好自由市场经济之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立论。

福山的说法却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对经济生活的分析，有百分之八十是正确的，那么剩下的百分之二十呢？福山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检讨，恰好反映在他与曼德维作品的对照上，《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个人追求私利的行为乃是创造社会财富的重要源头，诸如美、日、德，为何是那么成功，而晚近看似较成功发展的经济体，诸如意大利，韩国、台

湾、香港，他们是否遵循相同的发展途径？他们是真正的成功吗？他们与先进发展国家的模式有何异同？依福山的说法，在解释这些不同经济发展途径上，被忽略的乃是经济生活中的文化因素。严格来说，应该是文化社会因素，因为福山并未清楚区分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层面。信任不只是文化价值观，更具体体现在社会结构、团体结合的形式上。

福山首先对“理性地追求效益极大化”的“经济人”形象提出批评，他认为这个设定未必是中性且自明的。因为其中的重要概念，诸如理性、效益等概念意义的界定必然涉及社会文化的因素。若不然，将这些概念界定为纯然形式的概念，反而会丧失其解释力。就此而言，最有效率的经济行为，未必就是理性地追求效益极大化的行为。其次一个经济行为理性与否，常常必须放在其社会文化情境中来考量，比如日本的终身雇用制即是一例。进而言之，经济行为并不纯然是个人的活动，更是团体的活动。在财富被创造出来之前，人们就必须学会如何共同工作。最高的经济效率不见得是由理性追求私利的个人所达成的，反而是个人所组成的团体，做为一个既存的道德社群，他们更能有效率地合作。追求私利诚然是现代经济行为的推动力，但是单凭着对利益的追求并不足以成就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诚如韦伯所言，对于财富的欲求并非就是资本主义精神。

对福山而言，一个社会要能形塑有效合理经营的企业组织更是成就资本主义经济的要素。相对而言，美国、日本、德国是比较能自发地促成这样的企业组织，而法国、意大利、台湾和香港等则较无法组成这样的企业组织。关键在于这些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发展之初，都能以家族为基础，凝聚出有效的

企业经营组织。但是美、日、德等社会随后能自发地发展出超乎家族团体的大型企业组织，而法、意、台湾等地则无法如此。就算有大型企业组织也常是凭借国家干预而成，并非由社会内部自发促成的。

由此可见，能否形成一定规模的企业组织与经营形态，乃是经济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国际分工中，这个因素对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影响尤其重要。但是形成如此企业组织的力量并非来自理性追求效益极大化的个人，而必须有其社会文化基础，也就是社会内部原本就要有能力形成超乎家族团体的自愿结合。形塑这种自愿结合能力的强弱，端视社会中“自发社会力”（spontaneous sociability）的高低而定。自发社会力的高低也就表现了一个社会内部成员之间信任程度的高低。因此一个社会信任程度的高低乃成为其影响经济的重要文化因素。

相对于经济资本、人力资本而言，自发社会力可说是一种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一个社会结构开创怎样的工商经济，这和他们的社会资本息息相关。如果一个企业里的员工都遵循共通的伦理规范，彼此信任，那么企业的经营成本就会低多了。而且高度信任感能容许多样化的社会关系产生，因此这样的社会在组织上也比较有好的创新开发能力。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当时社会力旺盛的美国人率先发展了现代的公司形态，而二十世纪的日本人则开展了网络组织的可行性，而德国也同样是发展出大规模企业组织，高效率工作团队的佼佼者。如果拿各个经济体中，大规模企业的比例做个比较，就更能凸显社会资本或自发社会力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欧洲和北美洲，美国和德国的民营企业规模超出意大利和

法国甚多。

亚洲各国之间的对比更是鲜明,日本和韩国以大企业和高度集中的产业见长,而台湾和香港企业的规模则少多了。不过韩国大企业的发展与美、日、德不同,那是国家干预而成,并非是自发社会力所促成的。这样的对比正反映了社会内部信任程度的差异以及自发社会力的强弱。一般认为美国是以个人主义价值为中心的社会,日本则是国家至上的社会。但福山认为,就社会文化层面来分析,这种印象并不全然正确。相较于意大利、法国、中国与台湾,他们是低信任度的社会,往往将信任关系局限于家族之内,因此以家族企业居多,难以发展现代的专业管理公司与大企业。相较于此,美、日则是高信任度社会,因此能在个人、家族与国家之间发展出强有力的自愿结合,形塑出大企业与现代化的专业管理公司,而这是其经济能高度发展的关键。

《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福山的作品可说是现代版的《蜜蜂的寓言》,是《蜜蜂的寓言》的反讽版。

诚如福山所言,虽然经济活动和社会、政治生活纠结难分,可是当代经济学论述却提倡一种谬误的趋势,也就是将经济视为一种有其自身律则的领域,这种律则独立于社会生活的其他层面。然而福山的批评并非凭空而降的,从社会学理论的脉络来看,更可清楚掌握福山批判经济学讨论忽略社会文化因素的理论意涵。晚近格拉诺维特(Granovetter)以“低度社会化的人的概念”对经济人意象的批判,以及科曼(Coleman)对于信任分析,将信任视为社会资本的讨论,这些对福山的讨论都有重要的影响。

而在古典社会学家中,托克维尔(Tocqueville)对于美国社

导读：“蜜蜂的寓言”之现代版

会文化的分析；涂尔干强调专业团体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指出契约中的非契约因素对社会生活的意义，这些都是福山立论的基础。最重要的当然是韦伯对资本主义兴起的社会文化因素的讨论，这几乎是福山最根本的理论根源。事实上，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即已提出类似的讨论。韦伯认为，儒教的君子只致力于外表的端正，而不信任他人，就像他也相信别人不会信任他一样，这种不信任妨碍了所有的信用与商业的运作。这与清教徒互信恰为对比，尤其是清教徒在经济上信任教内弟兄之绝对不可动摇且受宗教的规范的廉正。在社会学理论反省的传统下，福山对经济理性的自足性提出深刻且具体的批判，写就这反讽《蜜蜂的寓言》的现代版。

一九九八年二月十三日

导读：信任塑造世界经济的主轴

本书为作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继其名著《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之后的另一本重要作品。然而,就其内容来看,这两本书的精神却是前后一贯的:自从一九八〇年代末期,东欧共产主义政权先后改变,前苏联随之解组以后,二次大战结束以来,东、西对峙的冷战格局已经走到“历史的终结”。冷战格局的结束意味着另一场战争的开始,用作者的语言来说:“在现代世界里,不仅战士文化已经中产阶级化,人们追求认同的热情也被利益所取代”、“经济生活已经升华,以往点燃政治界的竞争斗志,现在原封搬到经济活动中”。“企业经营所提供的机会变成无数野心分子的精力发泄管道,这些人过去只可能经由发动战争或革命来获得‘认同’。”

然而,人们在从事经济活动的时候,并不是像古典经济学家所描述的那样,以理性为基础来追求最大的功利。相反的,他们是以支撑自己社会生活的道德价值观作为基底,在从事经济活动。譬如,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弃武从商的武士在生意往来之间,并没有忘掉他们的武士道精神,他们反倒是把武士道精神用在商战之上。同样的概念也可以用来说明其他文化中的经济活动。由于经济活动变成全世界人民生活的主旋律,社会科学家们开始注意到经济活动中的“后现代现象”;当世界各国都学会源自于西方文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后,

他们并没有像六〇年代“现代化派”学者所预言的那样，将自己的文化传统完全舍弃掉。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都是一面保有自己核心的文化传统，一面又展开经济活动。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在这个经济挂帅的时代，人们在从事经济争战的时候，并没有完全忘掉“先辈的传统”。相反的，他们会在各种可及的文化资源中找寻认同对象，“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在福山的这本新书中，他收集了十分丰富的资料，深入探讨：当前世界上主要经济国家在塑造其经济社会的过程中，文化因素所扮演的巨大力量。比方说，在一九八〇年代，世界各国的社会科学界曾经掀起一阵“韦伯热”，大家一窝蜂地讨论儒家文化传统和东亚经济奇迹之间的关联。福山的这本新作则综合这一时期的讨论，指出几个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社会，在经济活动方面所展现出来的特色；日本人的长子继承制度、领养制度、明显缺乏家族主义，以及热衷于参加保存传统公益的“家元”团体，使他们能够将“信任”扩充到家人之外，并建立大型的工业组织。相对之下，中国人强势的家族主义、子嗣平分家产的制度、欠缺领养家族外成员的机制，再加上对外人的极度不信任，使得华人社会中，经济活动是以中小企业为主。韩国从朴正熙时代，便开始以国家力量全力扶植大企业，但 these 大企业却操控在少数几个家族手中。换言之，从福山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文化并不是僵固不变的一块“铁板”。在各种历史条件的交汇之下，同样的文化质素在不同的社会中，便会展现出不同的姿态。

在这本著作中，福山以细腻的笔触，逐一分析美、英、法、